

THE MARITAL STRATEGY OF CAINOZOIC PEASANT-WORKERS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报告

李德 著

A RESEARCH OF THE COMPARATION BETWEEN
SHANGHAI'S FACTORY AND
L VILLAGE, P COUNTY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报告

李 德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中国城乡社会的转型为写作背景,以农民工的婚姻作为研究视角,采用深入个案访谈、问卷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以上海市S厂和P县L村作为本书田野调查地点,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农民工婚姻策略的微妙变化,具体分析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来反映中国当前城乡社会转型面临的一些问题:用工荒、农民工培训、户籍改革、老龄化、农村养老保障体制、新农村建设、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入学等。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大学中社会学、人类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专业性研究农民工问题、婚姻问题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农民工政策的领导,也可以是广大普通读者,本书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既符合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报告/李德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313-07690-8

I. 新... II. 李... III. 民工—婚姻—研究报告—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1528 号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报告

李 德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同济大学印刷厂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5 字数:233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7690-8/D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65982320

在“行动”中，认识真实的中国

（代序）

前阵子，因为参加一个有关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行动计划，我在杭州给基层社区的工作人员做培训。午饭中，浙江大学的一位同行说，要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研究，而是行动，当时深以为然。

按我的理解，所谓“行动”不是指某种“参与式观察”，而是直接进入工作现场，做一些同今天中国社会变迁直接相关的事情。毫无疑问，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行动”根本上还是为了“研究”，但“行动”区别于通常的“研究”之处在于，前者比后者更加贴近现实，因此在认识当下中国时可以具有某种“肌肤感”。这对克服“中国研究热”中频繁出现的“想当然”，可能是一剂良药。

认识当下中国之不易，首先来自这个民族本身不太善于用实证方法来认识世界，更不用说人类世界。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主流，实证社会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但早在19世纪，西方学者如新康德主义流派在反思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倾向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科学的独特性，要求在研究“实然”的社会世界时，不能忘记其内含的“应然”或曰“价值”特性，而韦伯由此进一步将社会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内含的“价值因素”和研究者隐含的“价值偏好”加以区别，提出“价值无涉”的方法论原则，力图减轻研究者主观因素对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不自觉干预。在西方，这是科学地研究人类自身的一大理论和方法论进步。但在中国，由于“人文传统”的根深蒂固，从古至今，要让人不带价值偏好地、实证地研究现实社会，不说不可能，也是难以操作的。反映在方法论上，中国学者对“价值无涉”基本上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其不具有“可行性”。缺乏对自身价值偏好的反思，导致中国研究中一厢情愿之作从不鲜见。

其实，人能否认识世界，最大困难不在于世界的复杂，而在人用来看世界的眼睛有其自身边界：看世界的眼睛永远不可能看见自己，而不知道自身的局限，

就难以判断眼中的世界同真实世界到底相去多远。要摆脱“眼睛”的局限，最好的办法不是坐在安乐椅上玄思，而是走进生活，让实践中是否“行得通”来修正眼睛的偏差。相比单纯的“研究”，这种类似于“社会实验”的“行动”更受制于生活逻辑，研究者在“行动”中形成的认识，可以更贴近中国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肌肤感”。

认识当下中国之不易，又在于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先哲拥有极具穿透力的眼光，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句话点破了话语与现实的距离，打开了中国进入“意会”、“体悟”等非语言表达的大门，也堵住了通向概念和定义的通道。没有概念，也不需要概念，进而不需要作为搭建概念与概念关系之工具的形式逻辑，中国人在把握世界时，常常容易陷入“失语”的境地：有能力使用多种语言的国人都有“体会”，汉字更适合形象描绘，而非精确记述。借“西方概念”，说“中国事情”因此成为自19世纪来，中国学者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策略。如此“言必称希腊”常为人诟病，但这并非“崇洋媚外”情结所致，没有那么简单，缺乏从经验事实中提炼概念并加以精确界定的能力和习惯，没有自己的概念，才是根本原因。问题在于，概念就是眼光，习惯于用西方概念来观察和描述中国，最后得到的成果肯定会具有某种“卡通”性质。比如当下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论文，如果以农村为主题，几乎必引那几位西方学者的成果，让人常生好奇之心。这里最关键的不是引用外人的成果，而是完全被局限在外人的眼光之中，中国人看中国最后竟然看出“世界真奇妙”的效果。这同前几年中国学者翻译英语材料，连“孟子”都会译错，是一个道理。

目前，要完全走出西方的概念，进而超越西方的社会研究眼光，不说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中国要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分析工具，还有待时日。但在使用西方概念的同时，突破西方视野的局限，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其中最基础性的一步是回归日常生活，在“行动”中获得对西方概念、理论和眼光的自觉、主动和自主。

认识中国之不易，还在于中国社会仍处在转型之中。以1840年为时间界标的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尚未结束，也很难确定何时结束，甚至如今究竟走到了哪个节点，都可能引发争议。坐在车厢内，一个人很难从内部环境，来判断车到了哪里，偶尔望望车外，也不一定找得到参照物，因为走在一条全新的路上，结果只能按照别人对路径的描述，判断大概走到了什么地方。令人不愿接受的

是,这个“别人”只能是已经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了数百年的西方发达国家。“言必称希腊”因此不仅成为“研究者”的通病,也成为“行动者”的陷阱。中国社会到底哪些变了,哪些没变,哪些进入了所谓的“现代”,哪些甚至在“传统”的方向走得更远,哪些看似“现代”,其实更加“传统”,哪些原来被认为“传统”,却更能适应“现代”,如此这般的问题没搞清楚,高谈阔论“中国模式”或“文明型国家”,都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指鹿为马”。参照西方那匹“马”,来认识转型中国这头“鹿”,发生些许误会,还是可以理解的。承载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一个转身,转晕了国人的头脑,理论失去了方向,给感性,特别是那种带有创造性直觉的感性腾出了空间,在“行动”中,重建方向感,成为认识中国的必要条件。

作者李德博士在上海大学获得学位,这本书是他在学位论文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李博士不是我的学生,我甚至从未给他上过一次课。他之所以找我写序,不只是因为从事农民工研究多年,还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行动”的人,而我之所以愿意给这本书写序,是因为我从他的书中看到一种气质,这种气质恰同我上面谈到的“行动”及其重要性有关。

我不知道作者有没有参加大量的“行动”,但至少他有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与所研究的对象有共同生活的体验。一个贫瘠乡村中走出来的学子,一个曾经为学费出走的学子,一个同农民工一起住过窝棚的学子,他对当下中国的感觉是真切而且深切的。更为有利的是,相比童年伙伴,凭借20多年的学校教育,特别是从本科开始的学科训练,作者能够用学理世界的语言,来讲述那个他生长于其中、至今仍然时时接触的生活世界,而相比其他总在“研究”的学者,凭借与生活世界亲密无间的接触,作者在认识中国社会时,不至于像当年传道士初涉“野蛮社会”时那样,屡屡发出“世界真奇妙”之大惊小怪。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同为中国学者,当别人真诚地为农民工“重物质消费,轻精神消费”而惋惜时,作者则明白地告诉我们,大部分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最大问题是没得消费:那么一点收入,应付那么多的开支,他们的物质需求尚且不具有经济学的有效性,也就是没有支付能力作保证,何谈“精神消费”?确实,不是农民工不想消费,而是没有能力消费,或者只能把精神消费“打包”在物质消费之中:有谁统计了农民工花在春节回家的路上和走亲访友之际的经济支出中,到底有多少属于“物质消费”,多少属于“精神消费”?

没有学理,我们无法认识现实社会,借助学理,我们却有可能最后呈现一个

遭受“学理污染”的生活世界。对于认识中国的学者来说,这一“学理悖论”可能尤显突兀,但更可能不被察觉。

回归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借助向西方借来的概念和其他分析工具,找到当今中国社会变与不变之处,重新确定中国下一步的起点,所有这一切,不是这本书所能完成的,更不是作者已经完成的,但确实是他希望完成并作出了探索的。

在本书中,无论农民工,还是他们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距离,其实都只是作者丈量中国社会变迁的尺子。中国仍处变迁之中,每一项测量结果转瞬已经过时,唯一不变的是丈量仍在继续,方法还有用武之地。

顾 骏

2011年9月12日中秋

乡村是否终结？乡村是否衰落？

（代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城乡社会的转型，也是广大农民生产方式、婚姻家庭等生活实践变迁的历史进程，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难以消逝。

我生长在中原地区的一个小村庄，直到考上大学才恋恋不舍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祖辈们世代以种地为生，我的家庭经历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农民外出打工的整个历程。我父亲会一手精湛的木工技艺，当地百姓经常请我父亲做家具和一些农具。1976年，我父亲凭着精湛的手艺，在驻马店找到了一个临时工作。那时农村还是大集体，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不允许农民到城市打工，如果城里确实需要，村里就要开具介绍信，而且每年还要向村里上交一定费用，算是弥补在村里应该种地劳作的损失。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那里开始包产到户，我们家四口人，分到近10亩土地。当时的生产条件很落后，农业劳动全部靠人的体力和家庭养的牛、马、驴等大牲口来完成。除去暑假和寒假外，我们那里的小学 and 初中当时有6月份的麦忙假和10月份的秋忙假，假期是一周左右，学校放假的考虑就是要求孩子帮助父母抢收抢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老师全是民办教师，他们也有自己的责任田，也需要收获和耕种。收获的季节对于父老乡亲们来说是喜悦的，但更多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记得当时我和父母一起用镰刀割麦子，用牛等拉着石碾在场地上碾麦秸等。1988年左右，村里条件好的家庭买了手扶拖拉机，之后有的家庭开始买四轮拖拉机等，数量不多，但可以帮助村民做很多事情，减轻了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父亲在农闲时，还是到驻马店干活，和原来相比，不再向村里交钱，而且还带了村里很多人一起去。打工挣的钱不多，一个月也就150元左右，就是补贴家用，为我兄弟俩交学费，买些化肥等，一年的全

部收入,到年底没什么剩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地其他村民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大家都不是很富裕。跟父亲一起外出打工的村民,每到庄稼收获的季节,就要回来忙田地里面的事情,一忙完就要出去,跟候鸟一样往返于家与打工的地方。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村里和我一样大小的伙伴们兴起了一股出去打工的热潮。尤其是春节期间,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家过年,他们穿着新衣服,新皮鞋,拿着从城市里带回来的新玩意,说着城市里精彩的生活,让我们这些没出过门的人很是羡慕。一些学习成绩不好或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青少年,很多人过完年就跟着别人外出打工了。

我上初三时,父亲不再外出打工。当时我们那里的农民负担很重,粮食丰收之后,交完国家的公粮,各级政府的提留粮之后,所剩粮食已不多。父亲一个月到学校为我交一袋子小麦,大约100斤左右,算是我一个月在学校期间的口粮。由于当时正在长身体,但又不能多吃,否则就不够一个月吃的,经常半夜里饿醒,很难受。加上学习压力很大,考虑到弟弟将来还要上学,于是就在初三上半学期开始懈怠起来,天天想着如何辍学之后挣钱发财的事。后来就不想上学、想出去打工、将来供弟弟上学的事跟父母说了。父母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还采取各种办法逼着我去上学。我想父母逼我上学,一方面是我学习成绩好,从上学以来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第一,每次都参加乡、县举办的各种竞赛,经常获奖。另一方面是父母觉得在村里经常受人欺负,希望我将来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后,他们在村里也很有面子。初三下半学期时,我也想通了,就继续好好学习,由于基础好,中考时考得还算行,本来可以上个师范学校(中专),后来就直接上了县重点高中的重点班,发誓一定要考大学。我上高中期间,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大部分是在北京的饭店里工作,有做厨师的,有做面点师傅的,也有做凉菜的。他们找工作一般是通过亲戚或地缘网络资本,先出去的带领后来出去的,这样可以提供找工作的信息、暂时的住宿或手头紧时借些钱花,很少有人直接去到北京或其他地方找工作,那样风险太大。由于那时工作机会多,在城里如能找到工资相对较高,而且可以带亲戚朋友一起出去工作的人,被村民视为能人。

在高二暑期补完课,我觉得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才开学,就突发奇想,拿着几十块钱坐火车跑到北京,想挣些钱,以备高三学习、生活之用。由于没有身份

证,我找了很多地方,没有任何单位敢雇佣我。我很失落,沿着北京的大街漫无目的到处走,饿了就吃一点面包,渴了就喝自来水,第一天晚上,我翻过陶然亭公园的院墙,在公园里躺椅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我继续沿着北京的大街走了一天,到傍晚时分,饿得很厉害。当我走到一座立交桥下时,看到一个老大爷拉着架子车在捡破烂,就走向前去问他哪里人?老大爷说是河南的,我问河南哪里的?他说是驻马店的,然后我就抱着老大爷哭了起来,说我也是驻马店的,想暑假到北京打工挣点钱,但没身份证就没找到工作,已经两天没吃饱饭了。我说完就拿出学生证和获得的各种奖状给他看。老大爷看了我一下,说了一句:“跟我走吧!”我在后面推着架子车,跟着老大爷来到他们居住的地方。

记得当时是在北京市丰台区一个叫草桥的地方,来自驻马店上蔡县的16位农民工,挤在两间低矮的出租房里。没有床,大家就打地铺睡,把报纸、废纸板铺在地上,盖上从家里带来的床单和被子。一到住的地方,老大爷就赶紧给我做了一大锅面条,我连喝三洋瓷碗,当时真是饿坏了。这些农闲时出来讨生活的农民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拉着架子车在附近收破烂,也捡破烂,傍晚就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一天下来,收入有30块钱左右,他们舍不得花钱,白天在外面就买一些油条烧饼,晚上煮面条,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去供孩子上学、盖房子、娶媳妇、买化肥等。当时一个刚去不久的年轻人,身体不是很好,在大家的建议下才买一斤白糖,说是补补身体。居住在附近低矮民房里的大多是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工,房租与楼房相比,便宜很多,但居住条件很差,周边的生活环境也不是很好。

我于是就白天跟着老大爷去收破烂,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除了收、捡废品外,老大爷还带我路过北京动物园等一些旅游景点,由于买不起门票,就在栏杆外看。10多天之后的一天晚上,我喝完两碗面条,向老大爷提出要回家,因为快开学了,马上就要投入到紧张的高三学习生活。等屋里的人回来的差不多了,老大爷就召集大家开个会,意思就是我快开学了,要回去,他收破烂也挣不了几个钱,由于身体不好,每天还要买药吃,看大家能不能兑几个钱,把我的火车票给买了。大家一致同意老大爷的提议,于是你三块、他五块,大家总共兑了50多块,当时北京到驻马店的火车票是37块钱,剩下的钱就买了一些路上吃的。当时正好一个老乡要回家办事,老大爷就委托他一直把我送到我父母手里。我忘不掉这段经历,它使我加深了对农民工的热爱,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

重,对广大农民深深的感情,它也使我更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涯,更加努力。

十多年过去了,草桥这个地方或许已大规模改造,建了很多高楼,周边也变得很漂亮,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印象。2010年,2011年4月份,由于我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参与了一些中央调训班的教学活动,我两次见到了来自北京丰台区委副书记王苏维,向他讲述了十几年前我在丰台草桥的经历,他笑着对我说:“现在草桥这个地方变化很大,欢迎你故地重游。”

考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骑着自行车到上蔡县找那位帮助过我的老大爷,村民说他后来病情加重,很快就走了,这让我很难过。后来,由于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同时上学,我弟弟在初三时辍学跟着村里人到北京打工,成为第二代农民工。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民工潮,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打工。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以及工资待遇与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全国各地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还是那么多的农民工,还是那样的打工生活,唯一不变的还是他们缺乏对乡村土地的眷恋。

村里跟弟弟一样年龄的年轻人,常年在打工,即使是庄稼收获季节也不回来,很多结了婚,与父母分家后的年轻人就把村里的责任田交给别人种,也不要一分钱,在农业税没减免之前,只要求种地的村民把他应该交的公粮交掉,在春节回家时给些小麦面粉够过年的就行。现在虽然农业税免了,但当地种地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因为粮食价格国家控制得很严,一直卖不上好价钱,而且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大幅度上涨,农民一年忙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因此,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种地,常年在打工,只有过春节时才回家看看,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人、孩子及在外找不到工作的妇女。村里平时很冷清,几乎见不到年轻人,每次给家里的老父亲打电话,他总是说现在村里没一个年轻人,全是老人和孩子及跑来跑去的几条狗。新一代农民工虽然对生长的村庄有一定的感情,但很少愿意在家种地,他们更喜欢向往城里的生活,习惯了在城里打工。大量80后新生代农民工,更是没有务农的经历,也没有种地的技能,他们对农村已缺乏认同,但城市生活的不易使他们成为“无根”的一群人。

未来中国的乡村是否会终结?是否会衰落?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写到,“10~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较之工业的高速增长,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

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梦”。但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大量土地被征收,用于建设开发区、居住小区及公共工程,已使城郊大量的村庄消失。失地农民住上楼房,进入工厂工作,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大量农民走向终结。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1978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 17.9%,2009 年达到 46.6%。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 50%,到 2020 年城市化率将达到 55%到 60%,年均增长 1 个百分点以上。李培林曾做过一个统计,从 1985 年到 2001 年,在这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 940 617 个锐减到 709 257 个。仅 2001 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 2000 年减少了 25 458 个,平均每天减少约 70 个。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的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而现在,村庄和农民终结的速度更快。

城市是抽水机,城市是榨汁机,农村的劳动力、资金、资源等正在源源不断向城市聚集。但凡不靠城,不靠海,没有任何矿产旅游等资源的村庄正在逐步走向衰落,留下的只是空空的房屋及走也走不出去的老人,加上中国广大农村未富先老,养老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子女数量的渐少及常年不在身边,使未来农村老人的养老面临很多挑战。很多乡村,少了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与向往,更多的是悲壮与凄凉。未来中国一些城郊及发达地区乡村的终结难以避免,其他落后地区乡村的衰落则是必然。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对其故乡河南穰县梁庄未来发展充满了悲凉之情,他写道:“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即使在我离开故乡的这几十年,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灶的代名词?……”

水利部副部长鄂竟素 2011 年 3 月 5 日在中华环保世纪行启动典礼上指出,中国每年因水土流失丧失耕地约 100 万亩。“十五”期间,全国各类建设名

目扰动土地面积 5.53 万平方公里,弃土弃渣量 92.1 亿吨,每年因生产建设活动新增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 1.5 万平方公里,增长的水土流失量超过 3 亿吨,人为水土流失持续呈扩展趋势,一旦中国发生粮食危机,后果不堪设想,20 世纪 60 年代初历史上出现的三年自然灾害仍然让很多当年经历过的人刻骨铭心。据统计,中国目前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加上全部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有 3 亿 5 千万。当前高速发展的经济可以容纳这么多劳动力,但中国经济将来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吗?一旦中国经济发展放缓,这些回流到农村的大量劳动力如何安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正是由于自己成长的经历,我饱含着对我国广大乡村这种浓厚的情感,自进入大学以后,总想做些实际调查、写点东西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的转型与发展,但又迟迟找不到很好的切入点。2002 年春节,在我读硕士期间,在北京打工的弟弟回家结婚,对象是他在北京打工期间认识的同事,安徽界首人,两家相距 300 多里,算是跨省婚姻,我们村庄跟弟弟一样跨省结婚的有好几个,这对于倾向于在附近寻找婚姻伴侣的父辈们来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但最近几年,广大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春节回家探亲期间兴起了一股“闪婚潮”,即在短短的春节十多天里,附近村庄的适婚青年男女在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见面、下彩礼、订婚,并约定好来年举办婚礼等。这些微妙的变化给我很大启示。婚姻是人一生中重大的事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家庭辛辛苦苦种地、打工挣钱,很多就是围绕孩子的婚姻大事来展开,给子女盖房子、买嫁妆、办酒席,完成家庭的延续与家族的繁衍。基于此,本书以中国城乡社会的转型为背景,借鉴了布迪厄的“婚姻策略”这一概念,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界定,并把“婚姻策略”这一概念与理性选择理论、婚姻中的择偶标准进行的区别,重点强调了社会转型与农民工婚姻策略的辩证关系,即: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生存、生活实践决定了农民工的婚姻策略;农民工的婚姻策略反映了我国城乡社会的变迁。

本书选取上海 S 厂和 P 县 L 村作为田野调查地点,进行个案深入访谈,同时对在上海各个行业工作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研,结合他们的生活、生产实践,围绕与他们婚姻状况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在农民工婚姻场域(即婚姻圈)的社会圈中,由于受到我国传统婚姻“门当户对”的深远影响,及他们在城市中的客观现实生存状况,决定了农民工的婚姻社会圈是“同阶层”的。即使在上海等

大、中城市有少数从外地农村嫁过来的媳妇,本书分析后认为这是婚姻当事人及其家庭之间互补的需要,也并不是“高攀”或“低就”的婚姻。关于农民工婚姻场域的地域圈(即婚嫁距离),按照一般思路,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农民工常年在外打工,他们的交往圈扩大了,婚姻市场扩大,相应他们的婚嫁距离也会逐步扩大。但本书运用比较的研究法,通过对L村改革开放前结婚的村民与该村第一代、第二代、新一代农民工在不同社会时期的婚嫁距离,以及上海S厂已婚农民工的婚嫁距离和未婚农民工对自己将来婚嫁距离预期调查研究后认为,当前农民工婚嫁距离并不是随着中国城乡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逐步普遍性扩大,而是在相对扩大之后在逐步缩小。

关于农民工婚姻的自然资本因素,本书分析了不同时期L村三代外出农民工和上海S厂农民工与其父辈们在结婚年龄上的变化,及对婚姻伴侣在容貌要求上的差异。关于农民工婚姻中的经济资本策略,分析了青年农民工父辈们的婚姻支付,主要体现在高额的彩礼及其他结婚费用上,贫穷的家庭有时会选择倒插门、互换亲等形式来为孩子完婚的特殊社会现象。新一代青年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自由恋爱,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不要双方家庭支付高额彩礼及嫁妆,而是靠自己在城市打工挣的钱来解决自己的婚姻支付,在他们恋爱期间、结婚之前会有一些前期花费,但这也有前期花了钱而婚姻不成的风险,这与他们父辈们婚姻不成要退还彩礼的情况截然不同。

爱情源于实践,由于受到贫穷家境、单调生活、繁重劳动、媒人牵线的婚姻途径及传统观念的影响,L村改革开放前结婚的村民大都是“先结婚后培养感情”,且这种婚姻相对稳定,很少会出现因感情不和而离婚的现象;L村和上海S厂青年农民工越来越看重感情因素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倾向于“先培养感情后结婚”,出现了一些婚后因感情不和而离婚的现象。

由于长期以来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实施,农村家庭的小型化趋势明显,原来一个家庭有四个孩子的现象很普遍,而目前有的家庭很多是一个孩子,部分有两个孩子,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就极少。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加上我国很多农村地区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养老保障制度,很多老年人还是主要依靠子女来养老。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就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嫁到很远的地方。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农民工的报酬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越来越小,这也使一部分农民工回流到当地

所在的城市工作,便于照顾家,致使沿海发达地区出现所谓的“民工荒”。

计划生育政策、农民工的婚嫁距离、农村养老保障建设、民工荒等这些以前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似乎有了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通过农民工婚姻策略这一视角,反映中国城乡社会转型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正是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目 录

第 1 章 引子: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的婚姻演化	1
第一节 婚姻的时代烙印	1
第二节 相关文献梳理	4
第三节 研究特点	15
第 2 章 研究内容	17
第一节 场域是行动者的实践空间	18
第二节 惯习是行动者如何实践	19
第三节 资本是行动者用什么实践	20
第四节 实践理论下的婚姻策略	21
第 3 章 生活实践——田野调查地点概述	29
第一节 “盆景”效应的生存实践——P 县 L 村基本概况	30
第二节 生活实践的空间引力	42
第三节 有限发展的实践空间——上海市 S 厂基本概况	50
第 4 章 婚姻场域——农民工的婚姻圈	67
第一节 社会场域——农民工婚姻的“同阶层”性	68
第二节 空间场域——农民工婚姻的地域圈	87
第三节 小结	117

第 5 章 农民工婚姻的资本策略	120
第一节 自然资本	121
第二节 经济资本策略	142
第三节 小结	162
第 6 章 农民工婚姻的爱情策略	165
第一节 爱情源于实践	165
第二节 惯习、生存实践下的先婚后情	169
第三节 惯习外化、发展实践下的先情后婚	172
第四节 小结	177
第 7 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策略：远嫁(娶)还是回乡？	179
第一节 微妙变化：生存实践、时代折射	179
第二节 农民工的婚姻策略将何去何从	181
参考文献	185
附录	197
后记	220